

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9-63

2009年11月30日

鄭蘋如妹妹的述說

鄭靜芝口述 楊瑩整理

2009年9月21日、23日，鄭靜芝女士和筆者兩次談話。本文根據錄音歸納、整理，未經本人校閱。為使讀者更容易看清楚，添加了分段小標題和文字中很少幾個帶括號的提示。

鄭靜芝，又名鄭天如，鄭蘋如烈士的妹妹，如今獨自居住在美國洛杉磯東部哈仙達市（Hacienda）一個華人老年公寓。鄭靜芝女士是一位溫文爾雅、身帶貴族氣質的時尚老人，她皮膚白晰，燙過的短髮一絲不亂，可以看得出年輕時相當漂亮。在我拜訪前，老人病了十幾天，一見面就反復道“對不起”，說因為生病，家裡很亂。其實就我觀察，對於一個80多歲獨居的老人而言，家裡相當整潔、舒適。

在鄭女士娓娓道來的回憶中，她對烈士姐姐的痛惜，對父母雙親的敬重，對以往溫馨家庭的懷念，溢於言表。

“教忠有方”

我父親在留學日本時，就參加了革命黨的同盟會，主要是跟于右任老先生一起做事，他們兩個感情非常好，可以說像兄弟一樣，大家不分彼此。我後來幫于右任老先生在監察院工作，有時爸爸他們的革命黨朋友來探訪，于老先生就會叫我進去，介紹說這是誰誰的小姐。爸爸的朋友說，妳的媽媽好像是……，不講下去了，我就說我媽媽是日本人。噢，妳是日本太太生的。我就笑笑說，我爸爸窮的很，只有一個太太呀。我在老先生面前真的是比較輕鬆的。

說回來，那時可能是滿清政府吧，我父親在日本參加革命黨，主要負責幫助留學生。我母親是日本人，也幫忙我父親和革命黨做事情。父親在日本是學法律的，後來我看他的履歷，有幾位寫小說的告訴我，因為要在日本主持革命黨協助留學生的工作，為了能合法待在日本，爸爸在日本連續讀了兩個大學學歷。爸爸在文學方面很有研究，日文很不錯，幫留學生寫論文什麼的，幫忙把論文翻譯成日文，提供一些經濟資助。爸爸博學多才，對《易經》也很有研究，有好多人都很欽佩我爸爸，問他運程什麼的。爸爸回國比較晚，是在（辛亥）革命成功後。

我家一共五個孩子。大姐真如生在日本，蘋如是我二姐，她是否生在日本我就知道了，大我不到十歲，對人很客氣，總是笑嘻嘻的。她犧牲時有人說 26 歲，有的說 23 歲，我們家裡說是 23 歲。我大哥海澄是老三，後來當空軍飛行員犧牲了；二哥南陽是老四，學醫的；我叫天如，是家裡的老么，最小。那時主要都是姐姐在照顧我，媽媽主要幫忙照顧爸爸和他的朋友。爸爸對媽媽很尊敬，兩人感情非常好。

媽媽是日本人，她家裡的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，她從來不提，大概是那種日本武士道家庭吧，她講話偶而會流露出來，好像與政府有一定關係，說的難聽點，也許屬於後來慢慢衰敗下來的貴族。我們有一個表舅，在日本皇宮裡當醫生。媽媽是家裡的老九，媽媽嫁給爸爸時，跟家裡也鬧革命了，她家裡反對她嫁給中國人，把她的名字從戶籍中取消了。後來，只有媽媽的大哥偷偷與媽媽來往，好像他大媽媽 20 歲。

媽媽不太說話，很安靜。後來我才知道媽媽很了不起，在日本時就幫了爸爸很多忙，為革命做了很多事，但她從不多說話，很謙虛。我到了臺灣以後才知道，媽媽的中文非常好，可以寫中文信。媽媽去世的時候，蔣中正專門給題了一幅字，“教忠有方”，四個大大的字。上海淪陷時，人家問媽媽，妳是日本人，現在日本跟中國打仗，妳怎麼看？媽媽說我嫁的是中國人，姓中國姓，孩子也是中國姓，姓什麼，就是什麼地方的人，也是中國人。媽媽非常要面子。到臺灣後，我幫于右任老先生做事，在監察院管外交公關。有一次去日本大使家玩，他們開車送我回家，大使太太說順便來看媽媽，她們都認識，也很熟。剛好媽媽在家裡弄花草，穿了一件普通旗袍。大使太太一走，媽媽就罵我，妳怎麼可以這樣，不事先打招呼，多丟我們中國人的臉。她很少罵我。

父親後來在上海的法院裡做事，做到首席檢查官。法院在公共租界裡，叫特區法院，主要審判在上海犯罪的外國人。我父親雖然不是做政府工作，但和政府還是有來往的，他的許多朋友都在政府裡的。後來聽說父親另外給政府做工作，至於父親給政府做過什麼事情，之前我不曉得。這是重慶的一個材料，上面說到父親給政府做地下工作，這兒蓋著中華民國的印章，不可能是假的，上面有我父親和姐姐的事情（中央撫卹委員會發佈褒獎令說，

“鄭鉞同志蟄居上海，暗中指揮地下工作，並令其長女蘋如實行鋤奸，後遭敵偽毒手”）。¹ 其實他們搞不清楚，我父親和姐姐做的事情是單獨分開的，他們之間沒有聯繫。

我二姐比較活潑，初中的時候就寫壁報、寫傳單，打倒日本什麼的，很愛國。我母親也不管，由得她們去做。我那時雖然很小，但是還記得，有次家裡突然來了一些縫紉機，姐姐和同學們一起做衣服，說是給傷兵做衣服，大哥和二姐都很積極。後來兩個哥哥去日本留學，是官費留學，大哥學航空，二哥學醫，照理和父親會有一定關係。父親是租界法院的清官一個，我們家裡的生活不很富裕，可是生活很平穩，是很正常的家庭。就是有一點，我們的家教非常嚴，父親好說話，但管我們小孩子很嚴，我一直就覺得我們家很特別。比如父親哪天拿了一樣東西回來，也許是水果，這個東西很好吃，父親不說給我們，我們都不會要，他說你要吧，拿去吧，我們才會要。我父親非常愛小孩，可能我是最小吧，父親對我特別好些，對哥哥、姐姐差不多，都是很嚴格的。到臺灣後，有一次監察院女同事來我家玩，我們在外面大聲聊天。過了一會兒，媽媽就把我叫進去說，妳講話不可以這麼輕鬆，如果再這樣，我就不是叫妳進來，而是要到外面當著妳朋友的面說妳了。我們家就是這樣的，家教很嚴。

姐姐做這些（反戰抗日）事，受我表舅的影響很大。表舅姓阪，媽媽來到中國以後，他也來到了上海，還改姓中國姓，叫徐耀中，學講中文，學京戲，後來還娶了個中國太太，但沒有孩子，所以他很喜歡我們家的小孩子。日本和中國正式開戰以後，表舅來到我們家，不進來，只站在門口跟家裡傭人說，告訴他們，我

¹ 國民政府文官處公函：〈准中央撫卹委員會 36 年 11 月 4 日撫字第 1818 號函請轉陳明令褒揚鄭鉞同志一案經陳奉〉，複印件。引文中標點為筆者所加。

以後不會再來了，因為我是日本人，你們是中國人。然後他就做日本人的事情，開會反對戰爭什麼的，姐姐後來就是常常參加他們的會議。表舅雖然不再來我們家裡，但對我們小孩還是很好，有時在路上看到我們，經常給我們一些好吃的東西。他很喜歡我，可能我是家裡最小的吧。

後來二姐讀法律，認識一個男同學（嵇希宗），這個姓嵇的男同學年紀很大，他的女兒跟我差不多大。他想到我家來，向父親請教法律問題。一般情況下，姐姐的女同學來家裡都要被問來問去，更不要說男同學了。我當時想，這下連祖宗三代都要被查了。那個人姓嵇的同學來到我家裡，見到父親就鞠躬，表現得很尊敬，向父親請教了一大堆的法律問題。後來聊天才知道，原來他是陳立夫堂弟的朋友，我父親和陳立夫都是革命黨，也認識，所以父親允許讓他經常來家裡了。

那時姐姐和表舅很接近，他們都是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的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姐姐是想幫中國的忙，她常常接近舅舅，就是想從反對戰爭的日本人中幫忙中國探聽一些消息。舅舅的身份我實在不知道，在日本我們有好多親戚，我曾經調查，結果一個字都調查不出來，他們不給我。還是有個寫書的日本人，幫我找到媽媽家在日本的親戚。

舅舅和姐姐都是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的。那時候日本人分成兩派，一派是軍人，東條呀，部隊的，是要打仗的；另一派的是首相，是天皇的助手那一派，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。我姐姐經常跟這一派反對戰爭的日本人來往，參加他們的聚會。姐姐是日本血統，日文很好，他們日本人也不避諱，姐姐很懂得應付。姐姐把從日本人那兒聽來的消息，告訴姓嵇的，其實他是國民黨中統的，陳立夫是中統。我記得那時候姐姐沒有參加什麼中統，應該是最末了才參加

的。姐姐的條件是不管怎樣，你中統不能洩露我的名字，我幫你們忙，一有消息就告訴你們，可是你們千萬不能有底子。

其實姐姐在日本人之間來往探聽消息很不容易，又要上學，又要怕我爸爸管。我們家裡的家教很嚴，爸爸永遠是家裡的頭，雖然是交給媽媽管家，但爸爸一回家就要問，誰誰誰表現得怎麼樣。爸爸人緣很好，對外面的老百姓很好，他們有事都來找他，就是有一樣，我們家裡的家教很嚴，對跟什麼人來往，特別是女孩子，管得很緊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們萬宜坊的鄰居家，從美國來了個親戚，帶了個電吉他，她家的女兒跟姐姐是朋友，約好晚上讓姐姐過去聽。吃過晚飯，大概七點鐘左右，姐姐準備去，爸爸就不准她去。姐姐說：都約好的，去幾分鐘就好啦，否則太不好意思了。爸爸嚴肅地說：不要去就是不要去。我當時在旁邊聽了，覺得爸爸好嚴厲。

後來汪精衛要叛變，姐姐從日本人那裡聽來消息，就告訴姓嵇的，馬上通知重慶了。重慶說不可能呀，蔣介石下來就是汪精衛了，是二號人物，怎麼可能？姐姐又去問那些日本人，結果是真的，真的有人逃走了。這樣類似的事情，零零碎碎太多了。姐姐做的都是反對日本戰爭方面的事情。

挺身而出

那時候中國有個游擊隊，很大很大的司令，叫熊澗東。中國那時候好多地方都淪陷了，安徽沒有淪陷，游擊司令說起來都跟搞諜報的、中統局有關係。游擊隊司令被 76 號給抓到了，被關起來了，說要槍斃。有一天，游擊司令的太太來到我家，她個子不高，胖胖的，年紀有三四十歲，人家說她本事大得很，身上有兩把槍，開來

了三部車，聽說很厲害，後面都有機關槍，我不曉得，是聽說的。那時姐姐已經幫他們做事了，也認識他們的人了。她一進門第一句話，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時我 13 歲了，她一上來就對姐姐說：鄭小姐，妳的身份暴露了。她講“暴露”，當時我覺得“暴露”這兩個字很奇怪，所以記得非常清楚。姐姐就看著她，一直沒說話。她說，我沒辦法，我要救我丈夫，同時游擊隊也很需要他，那麼多人。我去找了漢奸的頭，就是那個姓丁的，他要認識妳。姐姐就一直不說話。司令太太說丁默邨作過妳的校長。姐姐一個初中生，怎麼能跟高中校長認識？姐姐一直沒說話，只是看著司令太太。丁默邨給司令太太開了三個條件，一個是要他們的副司令，副司令叫張瑞金，因為人家張瑞金很聰明，聽說抓權抓的很厲害，比熊潤東司令還厲害；第二個是有一個女的，常常跟另一派日本人在一起，長得很漂亮，有人說是日本人，有人說是中國人，對我們非常非常不利。司令太太就說，她是你的學生呀，我們熟的很，她是中國人。就這樣，她把姐姐給供出來了。丁默邨說我一定要認識她，妳給我這兩個人，我就放了司令。他一共提了三個條件，還有一個條件我不記得了。司令太太說，我為了救我丈夫，沒辦法呀，張瑞金已經給弄走了，是吃東西放上麻藥，已經給 76 號送過去了。丁默邨說要認識妳，現在怎麼辦？其實你們認識了也好，對妳爸爸也好，不然妳爸爸每天上班下班、進進出出的也不安全，對妳們家也好。那時候，我父親已經是首席檢查官，院長也沒有了，手下有兩個庭長，一個管民事，一個管刑事，不知民事還是刑事的庭長，就是郁達夫的哥哥，叫郁華，被他們暗殺打死了。他家裡也都是愛國的，他太太在幫忙傷員服務時，耳朵都被炸壞了。郁伯伯死了，我們家的人都很傷心，我當時小，不太曉得，看到爸爸媽媽很傷心，因為我們大家都很熟，姐姐知道後心裡也很氣。但是無論怎麼說，在那個時刻，76 號離

我們家根本遠得很，沒有什麼關係，而且他們已經開始殺人殺得不得了了。司令太太說他們就想要認識認識妳，怎麼樣？我們就等妳回信。姐姐就一直不說話，後來說讓我考慮考慮。這樣講完，司令太太說我等妳消息，就走了。

姐姐馬上把情況告訴姓嵇的。姓嵇的就跟陳立夫堂弟講了。陳立夫的堂弟叫陳寶驊，當時是在上海主持的頭，姐姐以前不認識他，就是這次才認識的。他跟姐姐說，重慶有消息來，要把丁默邨這個人去掉，這個人太危險了。這根本都是很晚發生的事情，書和文章什麼的都講，好像姐姐很早就認識姓丁的，根本不可能。我那時13歲，我記得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我姐姐和哥哥都是愛國的，我小時候也是愛國的，幫助他們做過事。陳寶驊說妳認識他以後，要想辦法把他騙出來，在外面才能把他殺掉。就是這樣才會有姐姐要去騙他出來。後來他們見過兩三次面，每次都有姓熊的司令太太在邊上。後來要動手的時候，當然熊太太不能在場。姓嵇的帶來一個姓陳的，叫陳彬，他們暗殺部分都由不同人負責，陳彬這個人手下是動槍的人。姓陳的就到我家裡來，本來是不可能來家裡的，應該那時候我父親已經知道姐姐做的事情了。郁華郁伯伯出事後，姐姐就跟爸爸攤牌了。本來我爸爸以前很不高興我姐姐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總是父親覺得他這個女兒有什麼事情，對她很嚴厲。到後來兩個人感情很好，因為爸爸已經曉得姐姐幹的事情了。後來另外一個庭長也給他們殺掉了。死得很可憐，是用斧頭砍死的。他的兒子是臺大的校長，叫錢思亮，錢思亮的兒子就是當大使的，叫錢復，報上從來都不登。76號的人真是狠毒。

就這樣，姐姐借機會認識了姓丁的，這是發生在很後面的事情了。妳說當時的一個初中生，怎麼可能與校長有什麼關係呢？當然姓丁的這種人有錢，兩人認識以後，要送東西給姐姐。姐姐就說那

送我皮大衣吧，因為賣皮大衣的那個地方，馬路很寬，很安靜，方便行動。姐姐跟中國方面已經說好了，動槍的那天是 24 號，也就是兩人認識以後短短幾天。根本不像外面的那些書上亂說，什麼在跳舞廳門口等，根本不可能，也不需要。因為我記得很清楚，都是在我家裡發生的事情。

那天汽車停在了皮衣店門口，時間很短，人根本還沒進去，小說上說的給錢什麼的根本沒有，人要是進去了，就不容易打了，一定要在外面。人要進去的時候就開槍，當時不知道出了什麼情況，負責開槍的兩個人中的一個人槍壞掉了，打不出子彈；另一個全打在了汽車上，沒打到人，失敗了。那是民國 29 年 12 月。那個時候我們在家裡頭，已經聽姓嵇和姓陳的兩個人說，中統的人在上海被抓了 80 幾個人。姐姐兜了幾個圈子回到家裡，姓丁的打電話到我家，讓姐姐去自首，說即使我放過妳，我手下的人也不答應。結果姐姐就和姓嵇的及陳彬商量。我始終懷疑這個陳彬已經叛變了，他手下一個人的槍子彈卡住了，不能打，一個子彈全打在汽車上，這不可能嘛，一定會有一槍能打到人身上。姓嵇的告訴姐姐說，妳不要管，快逃走。姐姐說爸爸年紀大了，還有這麼一大家人，我不能走。姓陳的就說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妳去自首，法律上自首的判刑都會減輕，況且我們裡面有人，說不定在裡面還能打死他。我那時候年紀小，在旁邊聽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危險，覺得跟演電影一樣。姐姐那時是抱著犧牲自己的精神，決定去自首。

25 號那天她跟媽媽說，不要在家裡做飯了，咱們出去吃吧，就陪媽媽和我們一起出去吃飯。父親在上班，沒有一起去。26 號下午三點半，姐姐走了。姐姐要走的時候我知道，我不記得我自己是怎麼樣表情，只記得我大姐的女兒——大姐結婚三年就去世

了，小外甥女由媽媽帶大，抱著姐姐哭呀哭呀，不讓她走。我也不記得那時是不是知道姐姐去自首，還是逃走，不過我記得那時候我贊成姐姐逃走，逃走只是一段危險的路，過去之後就是游擊隊了，就可以送到內地了，就安全了。我學醫的二哥知道姐姐是去自首的。

英勇犧牲

姐姐走了，後來寫過兩封信給家裡。媽媽心裡很難過，但也不說話。爸爸也不說話。爸爸平時下班都是六點多，26號那天回來特別早，四點半、五點就回來了。平時爸爸下班回來，都會很和藹地摸摸我的頭，問乖不乖呀。26號那天一回到家，就和媽媽講日語。爸爸平常跟媽媽在我們小孩子面前從來不講日文，除非兩個人有什麼事，關在房間裡才講日文。我不太懂日文，哥哥姐姐們都懂，我大概的意思能聽明白。爸爸馬上問媽媽姐姐在哪裡，然後就不再說話，回到自己屋子裡就起課。爸爸會《易經》，會算命，還挺準。我就聽見這麼一句話，“唉呀，從此以後我們見不到了。”

姐姐走了以後，家裡的氣氛很沉悶、很沉悶。我們全家人都心裡難過，但是大家也都不說出來，都如常生活。我每天放學回家，就希望能有什麼動靜，結果一直也沒有消息。我知道，如果爸爸答應去投降，他們一定會放回姐姐的。但是有一樣，汪精衛政府裡有的人也很恨我爸爸，爸爸是清官，跟他們不同，姐姐做這樣的事，他們很恨。可是日本人很想我爸爸去做事，日本人盯得很緊，派個律師叫陳紀鳳，來過兩次，勸說爸爸給日本人做事。當然爸爸一直沒有答應。

就這樣，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。2月份的一天，離姐姐走以後兩個多月，我放學回家，看到爸爸媽媽兩個抱在一起痛哭，我的小小哥哥靠在牆上哭，是有人告訴說姐姐已經犧牲了。我那時候很氣憤我的小小哥哥，衝上去埋怨他當初為什麼不勸姐姐逃走，我年紀小不懂，你年紀比我大呀，你不應該贊成姐姐去自首。現在想也許他心裡有苦衷，可能是冤枉他了。現在想起那天的情景，心裡還是很難受。

後來最難過的一件事，就是姐姐的屍首。76號人找我們家要錢，給了錢才能領回姐姐的屍首。他們要很多的錢。那時上海都被封鎖了，我們家沒有錢。姐姐出事以後，日本人把我們家的保險箱什麼的都封鎖了，是我陪媽媽去清點的保險箱，所以記得很清楚。結果，我們家拿不出錢，所以姐姐的屍首也沒有領到，至今也不知道在哪裡。

大陸方面沒話說，在上海福壽園給姐姐立了一個雕塑，雖然姐姐是國民黨，但還是把姐姐當烈士，那時候反對戰爭也不分什麼黨派的。本來要給姐姐做個墳的，可是什麼都沒有，找不到姐姐的遺骨，就立了個雕塑。我現在想起來，心裡還是很難過。這是我心裡很難過的一件事情。

原來在上海的時候，日本方面有個做情報的，叫花野吉平，很喜歡我姐姐，他們那時候都是四、五個人一起開會，沒有機會單獨相處。川島芳子手下有個很厲害的女間諜，叫渡邊的，喜歡花野，很嫉妒姐姐。姐姐犧牲以後，她就一直盯著我們家，不放過我們家，跟我們家搗亂。有一天我放學回家，發現兩個男人跟蹤我，我很害怕，就跳上有軌電車，跟司機說有人要綁票。那時候愛國的人很多，我在司機幫助下才逃掉跑回家。我也不懂為什麼要綁票我，可能是跟我爸爸有關吧。

一門忠烈

後來珍珠港事件發生，租界也沒有了，我爸爸就開始逃難了，在上海的朋友家裡東躲西藏，都是我陪著，前後有一年多時間。

那時候我爸爸在上海給重慶做一件事，幫助過很多人，幫助他們逃難到重慶去。很可惜，我把爸爸的名冊弄丟了。那個時候上海淪陷了，但租界還在，要逃難到重慶的那些人，先由爸爸寫信，再去找杜月笙的表弟，叫朱文德的，我們叫朱伯伯，是在銀行做事的，後來當了立法委員。從我爸爸那裡拿了信以後，再到朱伯伯他那邊去拿錢，再到重慶。因為逃難差不都是全家都過去，所以需要的錢很多。那些人拿了我爸爸寫的信，到重慶去就可以安排做事情，有工作做。我爸爸在上海就管這個事，應該是爸爸與朱伯伯他們兩個合作吧。後來爸爸身體實在不行了，病得很厲害，沒辦法就只好回家了。

回到家沒幾天，渡邊就來了，帶了三輛軍用汽車。她跟我媽媽很客氣地說，聽說妳先生不舒服，我們請了很好的醫生來看看他，是軍隊的醫生。媽媽說，謝謝妳！那時大家都有假面具，表面都客客氣氣的。我記得爸爸原來躺著，後來坐起身，醫生看了看，說不要緊，吃些補藥，然後就走了。我就知道爸爸病得很嚴重，否則日本人肯定要帶走爸爸的。爸爸後來不久就去世了。

爸爸去世也很特別。4月1號，媽媽到學校找我，讓我趕快回家，我還以為日本人又來搗亂呢。她說爸爸算了一卦，說他要走了，他要歸天了。我說：媽媽，今天是愚人節啊，爸爸在家裡沒事情太無聊，不要開玩笑。媽媽說，他很認真的，沒有開玩笑。我聽了趕緊跟媽媽回到家。那時小哥哥好像是住校。我們家很文明，家裡什麼話都攤開來說的。爸爸問我：媽媽有沒有告訴妳？

我回答說：媽媽告訴我了。爸爸說妳坐下。爸爸不叫我坐，我還會坐下呢。爸爸的原話我不大記得了，大概意思是：一個人不是說父母生下來就下來的，生下來時都是揣著一個包袱來的。就是說，人一生做好人，還是做壞人，在包袱裡都有。好人都是會到這個地方去。他指了指天，上面有好多好多門，好人怎樣都會到這個地方，我相信我做人還不錯，我也會到這個地方去，妳們放心，不要替我擔憂。我一聽就傻了，那時候家裡已經空了，本來還有朋友，因為日本人總來搗亂，也沒什麼人來我家了。我對爸爸說：媽媽是日本人，不懂中國規矩，我也不懂，（這後事）怎麼辦呢？爸爸說：這簡單得很，我的朋友都是佛教的，妳去請教他們，他們會幫忙安排。我告訴妳日子，今天是4月1日，一直到7號是最凶的日子，我決定8號走。我聽到以後趕快去找爸爸的好朋友，上海有名的小兒科醫生，把事情跟他說了。徐伯伯過了一會兒到我家，跟爸爸說他在附近出診，看過病人後順便來看看爸爸。他幫爸爸把了把脈，聊了一會兒就走了。照規矩客人走，我們都要送到門口的，徐伯伯就對我說，看來妳爸爸拖不到那麼久，也許是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。我說不會的，爸爸說是8號。徐伯伯走了以後，我問爸爸應該做些什麼？爸爸說，到5號，妳去找我的朋友，他們會來幫忙料理的。後來又交給我一個名單，說這上面都是去成都、重慶的人，讓我把這個名單帶到重慶去。那上面有70幾個人名，很遺憾，這個名單後來我怎麼也找不到了。

8號下午，爸爸開始吐血，一直吐。到了晚上，爸爸突然好了，不吐了。爸爸留著仁丹鬍子，他讓我幫忙修修。爸爸為了逗媽媽開心，我剪好後他開玩笑地對媽媽說：太太，這個小理髮師還不錯，要多給點小費。我當時還想，爸爸不像要走的樣子嘛，如果朋友明天一早來唸經，這不是騙人家嘛，多丟人。我哥哥這時也

趕回家了。爸爸對媽媽說：跟妳夫妻 30 年，都是平平安安、愉愉快快的，妳是個好太太，我也不是個壞傢伙，只有妳一個太太。因為那時好多人都有好幾個太太，爸爸只有媽媽一個日本太太。媽媽說：是呀，我也不壞呀，對你忠誠了 30 年。爸爸說，不見得吧，妳不是事事對我忠實吧。就指了哥哥的小孩對媽媽說，妳告訴我說這是真如同學的孩子，這其實是海澄的孩子吧。因為那時候規定學生不能結婚，大哥海澄去重慶以前瞞著家裡在上海偷偷結了婚。大哥去重慶以後，還曾經讓我去問大嫂能不能去重慶。後來大嫂跟別人去了馬來西亞，就把小孩交給我們家，媽媽怕爸爸生氣，沒有敢講實話，只說這是我大姐真如同學的孩子，寄養在我家。其實爸爸早就知道，只是一直不說破。爸爸又跟我和媽媽說，妳們不要哭，我就要脫離苦海了。因為爸爸生病，又要東躲西藏的，其實很辛苦。第二天一清早，爸爸的朋友來家裡唸經，爸爸就這樣走了，他走得很平靜。

爸爸走以後第三天，媽媽告訴我她夢到爸爸了，說爸爸穿著和尚衣服，頭上披著白紗，站在荷花上面，光著腳。過了兩個禮拜，我放學以後，順便去爸爸朋友家道謝，把媽媽的夢說了。爸爸的朋友告訴我，那不是荷花，應該是蓮花，說坐缸有一定規矩，怎麼是光著腳呢？讓我去殯儀館找懂佛的人再問問。結果我當天回家晚了。一回家，媽媽就埋怨我說，妳看妳真不孝順，不早點回來，我剛剛又見到妳爸爸了，仍舊頭披白紗，這次是坐在蓮花上，可還是光著腳。我一聽，馬上找了個同學，陪我趕快衝到殯儀館，因為天已經晚了，就快要戒嚴了。到了殯儀館，人家問我，這麼晚來這裡，妳不怕鬼？我說我爸爸是菩薩，我不怕。他們就說，居士是不是原來在小禮堂，後來轉到了大禮堂？因為當時我們家沒錢，選在小禮堂，後來爸爸的朋友不同意，就轉到了大禮

堂。我趕急說對呀。他說小禮堂留下包東西。拿來一看是一包鞋。我當即就燒掉了，回去以後又買了一包也燒掉了。後來，媽媽就再也沒做那樣的夢了。爸爸還交待我們，過三年把他火葬，原來三年以後打完仗了！結果，我叔叔呀，好多親戚都來了。爸爸都算好了。本來我是基督教學校，信奉耶穌，禮拜天要上教堂做禮拜，姐姐是天主教，講聖母瑪利亞。爸爸從來也不管，無所謂，那時候上海綁票很厲害，只要學校離家近，安全就好。

姐姐當時有個男朋友，叫王漢勛，江蘇宜興人。我們都認識，很熟，姐姐當時行動都有我嘛，好多時候都會帶著我這個小尾巴。他們是在同學會上認識的。當時上海許多人中學在大同中學，大學就上了上海交大。大同中學是胡家三兄弟辦的，很有名。大同中學校長胡敦復有一子二女，他家也住在萬宜坊，王漢勛跟他兒子是朋友吧，具體什麼關係我不太清楚，胡家小女兒胡福南，跟姐姐是同班同學，就這樣大家一起參加同學會。那時候時興同學之間軋朋友，結果把王漢勛拉給姐姐，這樣大家就認識了。認識不久，王漢勛就去了重慶。後來，兩個人都是靠通信聯絡。

王漢勛是空軍，是空運隊 20 大隊大隊長，管運輸，運東西、運人，還有轟炸，都是大飛機，後來執行任務時犧牲了。我大哥哥海澄從日本回國以後，不久也去了重慶當空軍。王漢勛的職位比我哥哥高好多，他是空軍二期的，我大哥哥是 11 期的。

王漢勛個子高高的，人很漂亮。宋美齡那時候管空軍，她出國去買飛機的時候，都是帶上他去的。他有個好處，就是大飛機、小飛機都能開。外國人分得清得很，開大飛機的不能開小飛機，開小飛機的不能開大飛機。

爸爸去世以後，為了安全，媽媽讓我逃難去重慶，投靠爸爸

的朋友于右任。當時日本、中國的飛機轟炸很多，船很遲才到漢口，重慶政府安排接我們這些家屬的人多等了兩個星期，等不到就回去了。一起的人有些就回去了，我不肯就這樣回去。當時瘧疾很嚴重，我把身上帶的金雞納膏都給了村長，說找游擊隊走。一路經湖南湘潭、長沙，身上帶的錢都用光了，後來我也得了瘧疾，路上很苦，耽擱了很長時間，輾轉經桂林到了四川。我到重慶以後，找到了有關係的人來接我，才知道大哥已經犧牲了。哥哥的同學告訴我，哥哥一直很擔心我，執行任務前還說，妹妹出來80多天了，還沒到，不知怎樣了。我很惱，沒有能見到大哥一面，就差四天。如果我能夠早一點到，就好了。

到重慶以後，我在成都見到了王漢勛，現在想起來還很難過。那時候在打仗，訊息很不通暢，尤其是他在成都空軍，整天在上面飛來飛去，也不太經常看報，所以他並不知道姐姐犧牲了。我告訴他姐姐不在了，他也不相信，以為我們在說假話騙他。見到我以後，他很傷心，掉眼淚了，問我是不是姐姐在上海跟別人結婚了，說我曉得妳姐姐很漂亮，上海有很多人追她，她怎麼可能等我這麼長時間，況且我待在這個地方，像個鄉巴佬一樣。他一直沒有忘記姐姐。那時候給他介紹女朋友的人很多，可有一樣，他請人家吃飯時說：唉呀，妳吃這麼多飯吶，我從前的女朋友，吃飯吃的少得很！每次出國，他都買了好多東西，都是給我姐姐的東西，衣服呀什麼的，那時交通不方便，沒法帶到上海，就都存在他一個同學叫毛瀛初的家裡。當時他還想讓我住到這個同學家裡，方便照顧我。我後來被于右任老先生安排住在張大千在成都的房子裡。他執行任務犧牲前幾天，還捎信給我：聽說妳要結婚了，我讓人帶個毯子和無線電，是送妳的結婚禮物。結果再也沒見到他，當然東西也沒有收到。

媒體炒作

其實關於姐姐、哥哥犧牲的事情，過去我們在家幾乎從來都不提，大家也不說，如常過日子，也沒有找過政府。關於姐姐的事情，現在出來的書啊文章什麼的，有好多根本是在亂編，編故事，他們說我姐姐要綁票日本首相的兒子，妳說他是他爸爸派來的，幫忙中國人的、反戰的，我姐姐綁票他有什麼用？這不是胡說八道嘛？其實很多小說、文章都是在編故事，實在是很幼稚。還有，說姐姐有屋子，姐姐哪裡有屋子，根本不可能的，我們每天到時候一定要回家。

前段時間有很多人來找我，有日本人、中國人，找到我家裡問我，像妳看這個就是上海《一個女間諜》那個寫小說的，叫許洪新寫來的，希望我能告訴他我家裡的事，就是姐姐的事，爸爸的事、媽媽的事，他根本不知道情況，否則不會寫這樣的信，讓我介紹下列什麼什麼人的情況，讓我詳細告訴他。我是告訴他一點點，但寫出來好多都不對。把我氣的呀，我都罵我上海的侄子，也就是我大哥的孩子，姐姐發生事情的時候，他才兩歲，話都不太會講，知道什麼事情呀！結果兩個人（侄子鄭國基和許洪新）做了好朋友了，在一起胡亂編，一下子說姐姐跟漢奸說：到我們家裡來坐一坐；一下子說姐姐在跳舞廳門口等他們。跳舞廳，我們家裡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，簡直莫名其妙嘛！其實我這個侄子很愛國，親自到重慶、南京的空軍烈士公墓的石碑去找大哥——也就是他父親的名字，可是卻把我姐姐弄得四不像，就好像從前小說裡的女間諜一樣，開玩笑，我們家裡那麼古板，怎麼可能。還有，我們家與周圍鄰居的關係很好，他們出的那本書裡說鄰居們拿石頭扔我媽媽，根本不可能有這回事！我很氣我上海的侄子，

不知道就不要亂編嘛。

還有這本書裡照片也修的四不像，把姐姐描的一塌糊塗，哪裡有這種笑話，畫得像什麼樣子？根本就不像了。哪有一個人的嘴像鳥的嘴一樣，突出來的？不提了！姐姐個子很高，五呎六吋，照相的時候總是人有點縮起來。還有，那時照相穿的衣服都很特別，是當女嬪相穿的，特殊場合才穿，平時生活中都不是這樣的。

李安的电影我没有看过，也不感兴趣。听说他请人吃饭，来了好多记者，可能是记者多事吧，说李安想见我。我没有理他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我们没什么话可谈。那时候我就开了一个记者会，我在记者会上没说什么，我也没骂人，也没说什么，就发了一个声明，只是说我很气愤。我就是表白一下，电影不真实。后来好多记者来过，还有香港的凤凰卫视。那时候我请了一个律师，姓方，后来才知道请错了，原来他跟李安他们都熟得不得了，糟糕的很。后来我就给了他一点钱，就算了。他就写了这么一封律师信，就在报纸上一登，有什么用？

妳看这个是日本写的东西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写我妈妈的身世。有人在日本拍了一个电视片，他们到我家裡，跟我谈过一点点，我反对了，说裡面的衣服也不对，时间也不对，讲话的态度也不对，你们拍电视一定要经过我本人同意。结果片子拍出来後也没有给我看。有朋友看到了，告诉我的，那时候我有好多情报来源。

我們家裡的家教很嚴，父親管我們管得很嚴，尤其對姐姐，我們每天到時候一定回家，姐姐根本不可能在外過夜，哪裡會在外面自己有房子？他們說姐姐帶著槍去76號自首，那也不對。姐姐是從家裡去自首的，我們家根本不可能有槍的。再說姐姐怎麼可能帶著槍去，那還不一下子被搜出來呀？有許多話，他們怎麼

可以亂寫？很幼稚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還有的說姐姐讓姓丁的到家裡來坐坐，準備在家裡進行暗殺，我們家裡面有老、有小，這麼多口人，妳說這可能嗎？怎麼搞行動，不是很可笑的事情？根本不符合事實嘛。有許多話很可笑，說姐姐在跳舞廳門口等，要找機會認識丁默邨，姐姐怎麼可能這麼做？首先跳舞廳，說起來在我們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根本扯不上關係；還有姐姐確實很漂亮，她守在那裡，人家一下子就會注意到，所以說真是很幼稚，怎麼可能呢！

因為媽媽是日本人，還有表舅的關係，我們家跟很多高尚日本人關係都很好，姐姐也跟很多高級的日本人都有來往，很熟悉的，經常參加他們的聚會。她要搜集情報，根本不需要去找漢奸。所以說那些書呀什麼的，根本是在瞎編。再有，就是一般有活動，姐姐也都會帶著“小尾巴”，或者我，或者小哥哥。我那時還小，去應酬不是帶我，多數是小哥哥跟著。我有時會被帶去參加那些反戰日本人的會議。他們有一個辦公室，很大的旅館裡，租了一層，幾間屋子。我一般都是在外面，有桌子、茶几什麼的，上面有些吃的、喝的東西，政治方面的事情我就不懂了。

那時爸爸和姐姐做事應該是分開的，爸爸有段時間很不高興我姐姐，回到家裡看到姐姐，我總是感覺他心裡有什麼特別的情緒。可能是爸爸不知道姐姐做的事，肯定是有朋友在外面看到了，回來講給爸爸聽，說你家小姐經常跟日本人在一起，怎樣怎樣的……。後來郁華給打死以後，姐姐就跟爸爸公開了她做的事，兩人的關係就好了。每天早上爸爸要上班去，經常會說：“我要去上班了，有沒有人有什麼事要我辦呀？有沒有信要去寄呀？”姐姐就說：“爸爸，……”爸爸就笑咪咪地說：“又是妳呀！那拿來吧。”這說明他同意姐姐和王漢勳的關係了，他認可他們倆

交朋友的關係了。所以說起來，我們家裡是很快樂、很幽默、很不錯的家庭。像電影、小說裡說的那些，好多都不是真實的。

還有一樣不好的事情，就是人家認為做間諜就都是浪漫得很，總是怎麼怎麼樣，姐姐又很漂亮，做這種事，就是利用這個啦，其實不是這樣的。想想真是太過分了！太氣憤了！唉，姐姐也真是……當然姐姐漂亮，有人喜歡她是另外一件事。被人喜歡很普通，我們也可能會有人喜歡嘛。

其實日本人還是很敬重我姐姐的，很尊敬我們家，特別是那些反對戰爭的日本人，如果不尊敬，事後就不會與我們再來往了。我還記得珍珠港事件的前兩天，有個日本人打電話來我家，那段時間家裡的電話都是媽媽接，他們講日文，意思讓爸爸趕緊逃走。我媽媽問為什麼要爸爸逃走，那邊就說日本人要進租界了，會對你們不利。媽媽問為什麼要告訴我們，那邊說因為我們欽佩愛國的人。

姐姐後來也救過共產黨。我記得有一個女的，是福建人，帶個孩子來，胖胖的，讓姐姐幫忙救她丈夫，因為我父親在法院有一定生殺權。姐姐幫她找了一個律師，教他寫一份悔過書，後來救出去，送到內地去了。還有其他的我就不記得了，只是因為她常常到家裡來找姐姐，帶個孩子，所以我記得。

本來想要出本書的，是中文，計劃在美國出，有兩個朋友幫我整理材料，因為我太生氣，前段時間一直生病，也就給耽擱下來了。我也是想不開的人，想到從前的事情，心裡覺得太冤枉，想到愛國愛到我們家這樣，哥哥、姐姐、爸爸、媽媽，還有姐姐的男朋友，最後被人家隨便拿來這樣亂寫，真是太冤枉了。唉，風風雨雨總是有很多事情，不提了。

……